

学习张闻天无私无畏地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

——纪念闻天诞辰 100 周年

李泽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于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的 1960 年至 1976 年，曾任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今年 8 月 30 日是张闻天诞辰 100 周年，本刊特发此文作为纪念。

今年 8 月 30 日，是张闻天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他的革命业绩，高尚的品格，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1959 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罢官后，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当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为了他研究工作的方便，经济研究所分党组给他分派了一位资料和联络人员，后来又派我协助他做理论研究工作。当时的所长孙冶方还特此给我打过招呼！

张闻天在经济研究所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文化大革命”中被秘密转移到广东韶关），撰写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性文稿和一批很有学术理论价值的笔记。这批文稿和笔记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问题。当然重点还是经济理论问题。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就是两条：一是要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是批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严重脱离实际，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时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急于求成，搞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居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批判。所以他要求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服务。

张闻天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在专题研究和撰写文稿与笔记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唯物辩证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和精辟见解，评述了有关权威人士的若干错误观点。这正好反映了他那无私无畏地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这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共产党人认真学习和思考！

为什么说张闻天的理论研究是无私无畏地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呢？这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他本人的政治处境来看，从他所研究的问题和内容来看，如果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如果没有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一般是不会进行这种具有重大政治理论性问题的研究的。

大家知道，他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打成“彭、黄、张、周”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置“身处逆境”于不顾，对有关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仍然坚持和继续深入地研究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过批判的问题和观点，力求探讨合乎规律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问题。为此，他研究和撰写了一系列政治理论性很强的文稿和笔记。例如针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写了要《正确认识 and 运用客观经济规律》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笔记（1961 年 7 月）。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接连写了两篇关于《当前的

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的笔记(1961年8月)。针对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观点和行为,诬蔑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理论是“需要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在笔记中写下了应当坚持“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的观点和内容(1961年8月)。针对“左倾”思想在理论界编写的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所反映出来的若干重要错误观点,他连续写了八篇笔记,批评这些教材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的观点,“见人不见物”的唯意志论倾向,只讲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否认平衡必要性的观点,把目前利益说成只是物质利益而把长远利益视为精神利益的观点,只讲“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利益原则的观点,宣扬“党政不分”、“包办代替”的观点,把党的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对立起来、全盘否定一长制的观点,把一切争论和不同观点都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分析了这些观点的片面性和错误(1961年8月)。针对当年急于搞“趁穷过渡”,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将其视为为时不久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在笔记中写下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1961年9月),分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阶段的联系和区别,对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历史地位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概括。后来又结合《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错误,以及联系《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1962年1月),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及利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反对吹嘘和急躁冒进等问题。针对党内领导层对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的不同意见,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指出这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而“不是两条道路问题”。(1962年7月)。农村改革实践经验表明了这种见解的科学性。与此同时,他在对江苏、浙江、上海和湖南等省市考察的基础上,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报告(1962年7月),后来又扩大成为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关于集市贸易的若干问题》的打印文稿。报告提出应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其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在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可在集市自由出售粮棉油等农副产品,允许个体商贩参加以便突破本地区范围的商品流通渠道等。这在当时是一种不符合个别领导人意图,而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政策性改革建议,是一种坚持、扩大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远见灼识。针对中国在“大跃进”运动中不讲经济效益,宣扬所谓“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其实政治账也是亏损的)的错误观点,1961年和1963年,先后写了两篇专论《读孙冶方同志的价值论》和《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两篇文稿不仅强调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的作用,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对斯大林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商品外壳”论和价值规律对其不起调节作用观点的否定,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规律的理论。针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点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颠倒敌我矛盾的“左倾”思想路线,先后于1964年1、2月和1973年12月,写下了《要用正确路线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矛盾》、《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几篇重要笔记。当时正是“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没有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深厚功底,是不敢这样碰“硬”、不敢写下这种“针锋相对”的笔墨的。众所周知,“一分为二”的观点,在6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曾经广为流传,影响巨大。张闻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清醒头脑,在笔记中明确指出:“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1964年2月)。这种“明察秋毫”的科学精神,实在难能可贵。针对“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宣扬“个人迷信”的错误观点,张闻天写下了《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2月)一篇重要笔记。严肃地指出:“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这个论断同邓小平和胡耀

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肯定和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据我的回忆，张闻天在同我研究问题和休息交谈中（他当年有高血压，我们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中间一定要在院子里休息散步一段时间。此时“天南地北”，无话不谈）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议论了许多政治理论性和社会经济生活话题。当时中央有关专门小组正在陆续撰写和定期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国内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和发展。我们谈论的话题自然要涉及到这些方面。在《九评》中将苏共中央领导集团定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并加以批判。我们的谈论并不涉及总的评价，只是对其中的某些论据进行议论。例如将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大学学历或学位作为变修的依据或者标志。对此张闻天苦笑着说，将某某领导人的学历作为修正主义的依据，这怎么会有说服力呢？马克思不是法学博士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来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大学毕业的人会越来越多，否则怎样会逐步缩小和解决体、脑劳动的差别问题。没有文化科学技术算什么社会主义，又怎么能建成社会主义？我接着补充说，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作为一般命题和原理来提，未必恰当和科学！否则人们就会以当文盲“为荣”了！其次，话题又转到了苏联的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问题。张闻天说，把这个问题作为修正主义的依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都是从人家报刊上摘录来的一些资料，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政策和管理问题。显然不足以为凭。其实，我们国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材料和问题，只是不公开登报罢了。另外，还谈到了国内一些问题和口号。说“穷则思变、变则富、富则修”。张闻天笑着说，这是什么逻辑？那我们还搞什么社会主义？他对鼓吹“趁穷过渡”特别反感，在提倡所谓“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年代，还要搞什么穷过渡，哪里还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这算什么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明确指出的：“穷不是社会主义”。

从我们列举的张闻天的若干政治经济学笔记和文稿的思路来看，他力求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各个专题研究，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即随着国家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此，对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存而不论），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虽然局部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发展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服务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教育。而决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与动力。要解决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和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总之，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才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为了深入了解张闻天担任特约研究员期间的经济思想，在扼要地分析了他的研究在与“左倾”错误观点作斗争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研究他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科学理论论著，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他同“左倾”思想路线作斗争的坚定性和系统性。一篇是在1963年4月撰写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篇是在1973年9月成文和定稿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早在1961年8月，在政治经济笔记中他就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这两篇论文是相辅相成的，抓住“左倾”思想路线篡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指导思想与发展动力这一类要害问题，从哲学的高度，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分析和批驳。

就《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的内容和写作背景来看，是以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击右倾翻案风”为背景的。还有，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提出并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三年困难的经济形势开始有所好转。此时，在1962年10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重又提出了所谓“反党集团”的问

题,并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表明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及其危害的严重性。

张闻天研究生产关系两重性问题理论,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结合“左倾”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和掌握这种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发展它的作用问题。从理论上解剖“趁穷过渡”和否定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观点,用“阶级斗争为纲”取代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的观点,乃至要由“政治决定经济”的观点。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观念。

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理论,研究和论述了七个问题:即关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涵义问题;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生产关系一般与所有制关系;《资本论》研究的主题就是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及其内在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是要在生产关系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构成存在着问题和缺点;最后归结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要研究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发展的规律性,即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对立统一的规律性。这是张闻天的一篇重要代表作,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含着同“左倾”思想路线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动力问题在理论上的交锋,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和前途问题。所以,研究和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容和概括,同传统观念的认识有所不同,有着它的新意。所谓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包含着这样几层涵义:

(1)鉴于理论界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争论,主要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争论。“割裂论”为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甚至可以决定生产力的论点提供了依据。联系到“左倾”错误路线大搞“趁穷过渡”、宣扬所谓“不断革命”的论调,引起了张闻天的重视和研究。认为“解决争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的关系”。

(2)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中表现出来,所以生产关系有它的两重性”。它包含有两个对立的方面,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易变性;另一方面就是所有制关系,它则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和相对稳定性。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有生产力就有生产关系,有生产关系就有生产力。二者是不能割裂的对立统一关系。

(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外部,而是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如果把二者加以割裂,既不能正确了解它们的同一性,也不能了解二者的差别性。

(5)必须懂得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发展,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另外,与此相关,还联系到正确认识和如何掌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同政治经济学脱离生产力孤立研究生产关系、或者可以脱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的传统观念不同,他认为政治经济学要在生产关系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避免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提供服务。

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是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综合性理论问题。弄清了这对基本矛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对于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闻天为了同“左倾”思想路线作斗争，还研究了与此相关的社会的另一对基本矛盾，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为此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是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的姊妹篇。

60年代特别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想路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科学辩证关系。他们把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物质基础”，说什么“宁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鼓吹“工厂不生产，但是路线正确”，“宁让老百姓啃树皮，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决定性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将他原来写的一篇笔记，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提纲》扩大为长篇科学论著（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5日）。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分析和论证。

针对“政治决定经济”的谬论，他在论文中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唯一科学的观点。”接着又说“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说，毫无共同之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这真是一针见血，何等尖锐啊！

在分析“政治决定论”的性质和思想根源问题时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政治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并且严肃地指出：“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谁不能“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谁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实在精辟、深刻。

该文在分析了“政治决定论”错误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论述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党的政治路线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关系。

张闻天在谈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又说，“无产阶级有为无产阶级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政治。”但起初无产阶级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经历了一个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要实现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就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呢？这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吗？不！这正是在给修正主义涂脂抹粉。一切修正主义者，口头上谈的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则是出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是为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而是攫取劳动人民的物质成果，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搞特殊化。”他严正地指出：“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有人“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这“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

欺骗。”这对那些自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的真实面貌的揭露，是何等中肯和透彻啊！

张闻天在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和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在正确认识社会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制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路线和策略。这种路线和策略，丝毫不能脱离经济，而只能为经济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政治，就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政治。”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不是违反这些规律，而是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事。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才会得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促进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行程。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如果违反这些经济规律，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只能起促退或破坏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路线，引起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否定，也是很自然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作用，但就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正确的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总是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正确的政治路线由于同经济相适应，最后必然要胜利。”实践反复证明，这不仅反映了当年对“左倾”错误路线和“文化大革命”警告的正确性，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的科学性。

最后，张闻天研究和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结合批评了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等错误观点。他谈到了无产阶级国家面前的三大任务：即镇压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对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的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强调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在批评所谓“革命”比建设更重要的观点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吗？决不是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这当然是对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莫大污辱！”在分析“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问题时指出：“有人不是天天自称‘高举’……旗帜吗？如果连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常识都丢掉，那还算什么‘高举’呢？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这种直言不讳、敢于碰硬的革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综上所述，从我们列举的张闻天的这些笔记和文稿的主要内容、观点和主张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 (1) 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
- (2)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说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它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 (3) 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 (4)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利用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服务；
- (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 (6) 要认清我们党内矛盾的性质，必须确定党内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法；反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乃至颠倒敌我矛盾；

(7)反对个人迷信和独断专横，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

(8)反对形而上学和唯意志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9)当年的研究和这各种观点都是针对“左倾”思想路线而发，乃至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和观点，所以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10)文稿和笔记反映了张闻天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他那种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地坚持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

总之，张闻天选择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是有其目的和用意的。他不畏艰险，要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当时虽说身处逆境，但对“左倾”思想路线和谬论的猖狂，实在无法忍受。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毫不动摇。但他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他相信只要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探索，就会寻求到一条合乎规律性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正是这种崇高的思想和精神，支持着他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进行研究，即使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尖锐，他也从不却步。不怕戴帽子打棍子，不怕碰硬，不畏风险，不屈不挠地为探索和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他所研究和论述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他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归根到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动力的公式，来取代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式，力求纠正“左倾”思想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罪过及其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严重的危害性。现在回忆起来，张闻天当年的许多见解和主张，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思路是相类似和一致的。由此可见，张闻天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是我们党的一位先驱。

张闻天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遵义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自己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中央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他为长征的胜利结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开辟和发展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同时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中央出版的《张闻天选集》和四卷文集以及他的社会主义论稿，就其内容、范围和理论观点来看，可谓博大精深。他在担任特约研究员期间的研究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调研和考察，治学态度严谨，无私无畏，不断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值此张闻天诞辰 100 周年之际，特撰文以兹纪念！

(责任编辑：边 齐)(校对：晓 鸥)